

#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娱活动

□ 胡平原



1943年,鲁艺秧歌队演出《拥军秧歌》一瞥资料图片

美国人马海德说:“在鲁艺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加,带动了交际舞会的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诞生出一种特定的“救助”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及部队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制大环境之中的“人性的亮丽闪动”。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描述,“延安曾有一股交际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最初的交际舞会,主要是在延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节目表演,后来普及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如延安的鲁艺、马列学院等处。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了例行活动。

王禹明在《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中提到,“蓝家坪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草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

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燕斌也回忆,“我在学会跳交际舞并成为积极分子之后,不论校内外,哪里有舞会,我总要想办法钻进去跳。舞场里没有专门的乐队,更没有什么音响设备,都是一些喜爱音乐的同志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既是乐队队员,又是跳舞的积极分子,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欢乐极了。当时延安普遍跳交际舞,有三步、四步之分,但节奏都比较慢,也比较文明。”

## 体育活动 增强体质

体育活动也是军民娱乐的形式之一。那时陕甘宁边区虽然条件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掀起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热潮。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人马海德描述延安每天的活动盛况在文章中,“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成群结队地跑步、做体操。午间,篮球、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拉拉队’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写道:“延安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做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大多因陋就简。延河成了群众的天然体育场。王禹明回忆:“夏季,屹立在河面上的巨石,正好成了天然的跳水台。站在巨石上,或者岸上,都可以欣赏到男、女健儿的仰泳、蛙泳、自由泳……”;“冬季,延河又是天然的滑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制成鞋底,安装上粗铁条,穿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冰鞋就可以滑冰了”。条件简陋,民众发挥才智,自己动手。燕斌谈到,“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差不多都是把两根木椽固定起来,上端钉上几块木板,木板

上再钉上铁匠打成的铁环,然后竖立在球场的两端,就开始进行比赛了。篮球胆和外面的球皮,也是补了再补,到实在不能使用时再设法弄个新的来。”



延安青年打篮球场景一瞥

诸多运动中,延安军民最喜爱、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当属球类运动。延安各个机关单位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在《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中说,“马列学院有出色的篮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其他单位,甚至远征到几百里外的绥德,当时在延安曾轰动一时”。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八路军的将领也经常参与各种体育赛事,燕斌回忆,“1942年秋,120师战斗篮球队由晋西北来延安参加篮球比赛,他们与延安市篮球队进行过几场精彩的比赛,地点都在延大斜对面的文化沟体育场,时间都在晚饭后。八路军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同志,也是每场必到”。每当燕斌晚饭后去延安大学南面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多次看到朱德和战士同场打篮球,在场上来回奔跑抢球。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丰富边区军民的文娱生活。

(连载下·全文完)

## ·珍赏·

# 吉祥如意“鲤鱼文化”

□ 王家年

笔者有一件晚清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瓷盘。瓷胎细腻,画工精细,鲤鱼栩栩如生。这种鲤鱼纹瓷盘,反映了当年流行的鲤鱼文化。

鲤鱼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被认为是祥瑞之物。《诗经·陈风·衡门》诗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将鲤鱼与娶妻联系起来,其原因是鲤鱼繁殖能力极强,生长迅速,象征着家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古往今来,很多题材的艺术品都喜欢使用鲤鱼纹饰,如瓷器、玉器、铜器及绘画等来表达祈望子孙绵延和丰收富裕的主题。鲤鱼,《诗经·国风》中描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河洛记》载:“伊洛鲂鲤,天下最美。”

战国时范蠡著的《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学著作,对养鲤鱼作了详细的记载。汉代,养鲤之风大盛。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辟了一个人工湖,供军队练习水战之用,公元前二世纪,汉昭帝把它变成大池塘,养的鲤鱼供皇室食用,还拿到市场上出售,使长安鱼价大跌。

鲤鱼在人们食物中的“高贵”地位,使古人把它看成是尊贵的象征。《史记》载:孔子生儿子时,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荣君”的赏赐,将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儿子的住处,被称“鲤庭”,“鲤庭”一词历史上作为一个泛称受“父训”场所之专用名词流传下来。唐代诗人刘禹锡写有诗句:“鲤庭传事业,鸡树遂翱翔。”古代官场,



“鲤鱼符”成了权力象征。汉、唐两代,任命地方官到任,必须出示左鱼,与原留任所藏右鱼相合,作为凭证。装“鱼符”的袋子,宋代叫“鱼袋”,绣有鲤鱼的形状,三品官以上用金为饰,五品官以上用银为饰。宋代废除了“鱼符相合”的制度,但官服上仍保留“鱼袋”,系在身后。

古人把鲤鱼比作“信使”,把书信称作“鱼书”。古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有描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唐代,人们寄书信时常常以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李商隐诗中有“双鲤迢迢一纸书”之句。

杜甫《寄高十五詹事》云:“天上多鸿雁,池

中足鲤鱼。”李郭在《南池》描绘了喂鲤鱼的生动情景:“小男供饵妇搓丝,溢釜香醪倒接罹。日出两竿鱼正食,一家欢笑在南池。”戴叔伦在《兰溪棹歌》中,把活跃的鲤鱼与寂静的凉月、山色相对描绘,使江上的景色静中有动、生意盎然:“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反映了人们对鲤鱼的珍爱:“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骏马,侍女金盘鲙鲤鱼。”

唐章孝标《鲤鱼》:“眼似真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浪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鲤鱼不论品种都充满活力、善跳跃,就有了“跳龙门”之说。龙门作为地名,《辞海》载有10多处;跳“龙门”的龙门,指山西河津西北、陕西韩城东北的地方,那里分跨黄河两岸,形如门阙,相传为夏禹导河至此,凿而通流。《三秦记》中云:“江海鱼集龙门下,登者化龙,不登者点额暴腮。”神话流传下来,鲤鱼就成了一种代表和象征:“龙门喻高名硕望,凡得其接引而增长身价者,谓之登龙门。”“登龙门”之说,由鲤鱼跳跃而来,但它的引用和解释,却因时代和阶层的不同而异。

千百年来,人们对鲤鱼的观察和亲近接触中,生发出种种精神上的“附加物”,寄托着多个阶层人群的理解和愿望,逐渐形成了丰富的“鲤鱼文化”。

## ·丝路文史·

# 老成都百年酱园“太和号”记趣

□ 王淼

## 从卓相爷开酱园谈起

蜀中,卓文君当垆买酒被传为千古美谈;而卖酱也属雅事,却鲜为人知。《宋史·隐逸传》说:“薛翁即薛翁,蜀隐君子善易,以卖酱隐。卖酱有隐士风雅,故经营酱园的就不足官宦之家。”清道光年间,成都街头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卓秉恬,卖过酱,道光年间拜过相;门前桅杆斗加斗,广益号的好酱油;柜上站了四个“吼”,斗大酱字映壁头。

卓秉恬,华阳人士,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官拜文渊阁大学士。他的相府在棉花街,即现在的成都市东风路二段。广益号是他家开的酱园。因为主人是“相爷”,位高身荣,广益号也特别讲排场。其柜台上总摆着四个方形锡盒,上有木制的油漆小圆盖,状如凸,象征着四个护兵的头盔。过去官吏出

门,有护兵吼道开路,显示威风。因此,护兵被称为“吼谷”。柜上放四顶象征性头盔,表示有四个“吼谷”站班。桅杆“斗加斗”即指双斗桅杆。酱园的身价被抬高,其伙计也被尊为先生。酱园铺面的后进,有一堵大照壁,上书着斗大一个“酱”字,四周配以图案,可与官家当铺的“当”字媲美,以显示大商家的阔绰气派。以后,各酱园相继仿效,成为大酱园的标志。

主人看重,东西又好,市民对广益号非常信赖。当时有一则趣闻:有人买了酱油回家,家里认为不是广益号的酱油不要,令其退掉另买。其人无法,只好乱打主意,在路上吐了一泡口水在酱油里,回去撒谎说已换成广益号的。家里人拿过瓶子一看,大喜说:“这才是广益号的好酱油嘛,泡泡儿还没有散呢。”

相爷家卖酱,促成了近代成都酱园业的兴

盛,其标志是酱园公所的建立。《成都县志·同治十三年》载:“酱园公所,咸丰三年(1853年)酱园行捐资公置。”该所建立在北门口福街。当时商界中建立“公所”这样规模的组织并不多。酱园业众多的神会,如太阳会、雷神会、文昌帝会、财神会等,年年都在酱园公所举行。

酱园行还捐购义塚两处。一处在北凤凰山附近,一处在青羊官廋祖庙附近,共占地两百余亩。两处各树一座“酱园碑”。碑上雕刻着捐款酱园的招牌和捐款数目。记得有广益号、永茂号、太和号、豫昌隆、秀谷园、正昌德、生山号、时昌号、同太号等数十家。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酱园行改组帮会,分为盐酒帮和酱园帮。据史载:酱园帮有卓氏广益号,陈氏正昌通,胡氏太和号等四十余家。

(连载一)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同时,为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不朽功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颁发勋章和奖章。

此次授勋原则上只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内的现役军人。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时已转业到地方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周保中和原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都因为在军队中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了三枚一级勋章,而授予两枚一级勋章的也仅有两人,一位是东北抗联的代表、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另一位是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周文龙。

周文龙,湖南浏阳人,1909年出生,中学学历。1929年参加浏阳赤卫队,并任农民协会秘书。1930年4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进驻浏阳文家市。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成立,彭德怀任前委书记、总指挥,政治委员为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从此,周文龙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

一入伍,读过中学的周文龙就被直接分配到刚组建的8军4师司令部任书记官,不久,调任军团总指挥部秘书。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调任红一方面军第21军军部管理科长。1933年6月,部队缩编,周文龙改任三军团5师作战参谋。1934年1月,杨尚昆调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与性格刚烈的著名战将彭德怀搭档。5月,国民党调集11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惨烈的广昌保卫战拉开了序幕,战斗中,周文龙接任14团3营营长,表现得英勇顽强,而且第三次身负重伤,左腿伤情尤为严重,臀部骨头受损。为此,周文龙还获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底,在得知部队有重大行动并且已经开拔的消息,周文龙不顾未曾痊愈的伤情,以顽强的毅力,拄着拐杖赶上了三军团总指挥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回到5师后,周文龙改任14团作战参谋。11月27日,新圩阻击战展开,战斗激烈、血腥,攻守反复达4次之多,政委重伤,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相继牺牲,危难时刻,周文龙挺身而出,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近20倍于己的敌军鏖战3天3夜,协同侧翼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级建制,红5师缩编为13团,周文龙出任团管理主任,团长是周恩来最喜欢的两个知识分子战将之一的“完美将军”彭雪枫。1935年9月,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二纵队,周文龙任二纵司令部管理科科长,老领导杨尚昆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到了红军大学,杨尚昆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又战斗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战友。

周文龙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后,12月毕业留校,任校务部副部长,部长是被誉为“红色管家”的杨立三。据开国中将、原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回忆:因组织安排,他没有等到毕业典礼就离开抗大。他后来给抗大校务部部长周文龙索要毕业证书,周文龙给他寄去证书,并开玩笑说他是:“开学晚来,毕业早走,无始无终”。

“红小鬼”张震与周文龙都是1930年7月参加红三军团的,只不过一个是在浏阳,一个是在平江。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杨立三部长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调任中央军委总兵站部部长,对外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十八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

1940年3月,周文龙也离开了抗大,调任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而此时,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长兼政委的正是老领导杨立三,杨立三是在1939年4月,应朱德、彭德怀、左权的联名电请,赴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的。

接到调任命令,周文龙马上跟随朱德总司令历经千辛万苦,一路斗智斗勇圆满地完成了从西安领取军饷、辎重的重要任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左权,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对他予以高度赞扬。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周文龙还兼任了冀南银行副董事长,根据总部首长关于“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自己小后方”的指示,巩固建设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利用山区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计满足军民需要。

1942年7月,日军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辽县麻田进犯,周文龙率领警卫战士、后勤干部与敌人周旋三天三夜,没有让供给部管理的弹药出现丝毫问题,更没有让经费损失一分一毫。

1942年8月,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被任命兼任八路军前总副参谋长,时任前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兼供给部政委的周文龙,担当起了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政委的重任。

解放战争中,周文龙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委,受命组织上党战役的后勤保卫工作。他高效的工作能力,严谨的工作作风,受到刘、邓首长的嘉许。

1948年,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三大战役开始之际,周文龙负责组建华北军区石家庄办事处,完成了淮海、平津、太原战役的物资调供,保障了四野南下,装备了18、19兵团进军大西北。

对于从事后勤工作的周文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在全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上说:“后勤工作在军队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做好本职工作,老同志要带头,首先是‘两杨两周’责无旁贷。”这里的“两周”,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周文龙。

1949年7月,周文龙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参谋主任兼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55年,国务院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约周文龙到中南海聚仁堂谈话:“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了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还是有经验的。”随后,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9月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自此,周文龙十分遗憾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失之交臂,但为了褒奖他在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被授予两枚一级勋章的无衔将军

□ 周立军